

先知三部曲

武装的先知 | 托洛茨基
1879—1921

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1921

〔波〕伊萨克·多伊彻 (Isaac Deutscher) 著

Leon Trotsky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先知三部曲

武装的先知 | 托洛茨基 1879—1921

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1921

〔波〕伊萨克·多伊彻 (Isaac Deutscher) 著

王国龙 译

施用勤 张以童 校

特别策划 郑超麟

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 – 1921

by ISAAC DEUTSCHER© Verso 2003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879—1921/(波)多伊彻(Deutscher, I.)著;施用勤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2

(先知三部曲)

ISBN 978-7-5117-1424-4

I. ①武…

II. ①多… ②施…

III. ①托洛茨基(1879—1940) - 传记

IV. ①K835.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1759 号

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879—1921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谭洁

责任编辑 刘庸安 贾宇琰 侯天保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75(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址 www.cctphome.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 787毫米×960毫米 1/16

字数 555千字

印张 33

版次 201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258.00元(全三册)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再版译者前言

十月革命的暴力和不够暴力

此书再版与初版虽然只相隔了13年，但在这13年里，中国学界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得1999年底或2000年初，席殊书屋在评1999年十大好书时，评委之一、经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大块理论文章的中共理论家龚育之对某些学者提议把《先知三部曲》列入1999年十大好书提出异议，说如果这样的话，就要对联共（布）党史重新评价。

2007年2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的一篇标题为“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的文章，说的就不是联共（布）各派人物的是非对错的问题了，而是彻底否定十月革命和苏联共产党，从它的领袖列宁开始。文章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搞密谋策划的布朗基主义，搞的是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是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不是他晚年更加成熟的思想——民主革命。据此，作者不仅把斯大林的专制暴政，甚至连中国的“反右”、“文化大革命”都算到十月革命的账上。这已经不是如何评价联共（布）党史了，而是在否定暴力革命下彻底否定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了。大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重归革命家行列才不会引起异议。因为此时，革命家已被视为洪水猛兽、罪恶渊薮。这使笔者想起1991年在参观莫斯科的一个庄园时看到的一个挂盘，上面画着一条俄国民间故事中的多头恶龙，这条恶龙最大的一颗头是列宁，在他的两边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也在其中。当年用屠刀划出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鸿沟，在时隔50多年后，在革命不再神圣时，消弭了，让人感到当年的屠杀者枉费心机，牺牲者的血则白流了。

2007年是十月革命90周年。按以往的惯例，每年11月7日，中央电视台总要播放俄共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周年的游行，游行着举着红旗和列宁肖像的新闻，还要播一个专题片。然而这一年不知什么原因，央视不仅没有播放专题片，连相关的新闻报导都没有。想必不是因为俄罗斯在这一天没有人或政党再为纪念十月革命而游行了。正式刊物除了《炎黄春秋》在11月号上又刊登了一篇否定十月革命的文章外，也几乎没有一家刊物刊登相关文章。

这段时间内，在民间网络上却形成了关注十月革命的一个小高潮，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某个“知道分子”称十月革命时并没有发生像样的战斗，因此不能算是革命。有人借题发挥，指责媒体把华南虎照片的真假炒得沸沸扬扬，却对十月革命的真假缄口不言。这些人同样是要否定十月革命，但与上面提到的那位作者不同，不是因为它是暴力革命，而是因为它不够暴力。革命在后革命时代的尴尬，在这两种声讨声中尽显无遗。

笔者根据近年来对十月革命的研究，写了《解读十月革命》一文，指出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背叛马克思主义是铁案如山，根据是马克思一直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没有给它加任何限定，说在和平时期联合，而在战争期间就应该为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相互厮杀。另外证明，十月革命并非像以往所宣传的那样，是一场暴力革命，更不像《民主社会主义》一文的作者所说的那样，是布朗基式的密谋策划的阴谋活动，而是一场苏维埃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靠的是公开的宣传鼓动工作，赢得了苏维埃的多数，其中没有任何阴谋可言。在二月革命后建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是微不足道的少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绝大多数，临时政府也是由它们组成，倒是它们在政治斗争中使用了阴谋手段，如串通帝国主义盟国阻止流亡国外的反战的国际主义者回国。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袖正是因此不得已而乘德国总参谋部提供的铅封车返回俄国。持合法手续回国的托洛茨基更是在旅途中被英国海军截下，在战俘营中拘押了一个月。在6月18日为帝国主义盟国和本国资产阶级利益而发动的进攻失败后，克伦斯基政府和苏维埃多数派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反战的布尔什维克，借列宁乘德国铅封车回国一事把布尔什维克领袖诬陷为德国特务，宣布布尔什维克为反革命政党，捣毁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查封它的报纸，通缉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袖，把托洛茨基等人投入监狱。然而，这些阴谋再加上权力，也未能阻止革命的进程。原因并不是布尔什维克阴谋，而是他们严格遵循革命的内在逻辑，并把这一逻辑贯彻到底。

革命本是社会矛盾极度激化的产物。二月革命也不例外。二月革命的口号是“和平、土地、面包”，其中的阶级内容是显而易见的。和平就是停止战争，反对资产阶级扩张和争夺市场的野心，土地就是农民要求把大地主和贵族的土地分给农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战争，大概是不能否定的。这不是布尔什维克下的定义。在大战爆发前，第二国际开过三次大会，谴责战争。而市场和殖民地是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所要求的。要停止战争，就要反对那些挑起战争或要发战争财的人。二月革命后组建的立宪民主党和进步集团的政府虽然不是发动战争的政府，但它坚持把战争进行到底，是为了俄国资本家的利益：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占领君士坦丁堡。新政府继续参战，除了盟国的胁迫，也出于想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分一杯羹的本国资产阶级的要求。

“和平、土地、面包”是普通群众的要求，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要求。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胜利的二月革命后组建的人民革命机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多数和领导党，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或是履行革命党的职责，满足群众在二月革命中提出的要求，将革命进行到底，因为二月革命只是推翻了沙皇，并没有实现人民对“和平、土地、面包”的要求；或是干脆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让它把战争进行到底，实现其扩张野心。但他们既不领导群众完成革命，也没有把政权完全交给资产阶级。他们只是请杜马临时委员会出来组阁，而自己仍作为苏维埃的领导党，在第一届资产阶级政府垮台后，他们坚持要建立联合政府，即社会主义者与资本家的联合政府，企图充当革命人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协调者的角色。这是任何一个政党在革命中都无法扮演的角色。人民要求和平，而资产阶级要求把战争进行到底，这二者之间是不能调和的；人民要求土地，而与大地主和贵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俄国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满足人民的这个要求的，这也同样是不可调和的。妄图调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的必然失败。他们既不能让资产阶级、地主贵族放弃扩张野心，把土地分给人民，也不能让经过革命洗礼的人民群众继续像以前一样地为前者当牛做马，为他们的利益而流血牺牲。因此，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前的八个月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没有为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和平和土地——向前迈进一步，倒是在这两个问题上迎合资产阶级的要求，现在他们打着保卫俄国革命的旗号继续战争，打着维护革命秩序的旗号镇压农民自发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但他们毕竟是苏维埃的多数党，承受着这个革命机构的压

力，不能完全无视人民的要求，彻底站到资产阶级一边。就这样，他们迅速地耗尽了他们在二月革命中赢得的资本，灰溜溜地退出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在6月举行的全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们能得到5/6的选票，而在科尔尼洛夫暴乱后，他们在彼得格勒市杜马的选举中就已落败，在9月举行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两党的席位加在一起还比布尔什维克少4席。在10月召开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占压倒多数。

托洛茨基后来总结说，如果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他们当权时，能够解决和平和土地问题，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其实，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失败之处，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功之处。他们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支持人民的和平与土地的要求，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权力交给资产阶级或与资产阶级联合组阁。他们对人民耐心地解释，只有建立人民政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才能给人民带来和平和土地，而资产阶级政权（联合政权也一样），只能让人民继续为英法美交易所老板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流血牺牲。当人民的希望一次次地破灭，布尔什维克的预言和对临时政府及苏维埃的多数党的批评一次次地被现实所证实时，人民转向了布尔什维克，把他们对和平和土地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党的身上。而布尔什维克也没有欺骗人民。它以大无畏的精神与本国和盟国的资产阶级决裂，在它的《和平宣言》遭到盟国拒绝的情况下，毅然与德国和奥匈帝国单独媾和，并把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了人民的这两个基本要求。这就是谴责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站不住脚的原因，也是它不够暴力的原因。因为它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苏维埃民主革命。

解散立宪会议

当然，现在国内学界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不仅仅局限于十月革命的本身，它是暴力的或不够暴力上，对十月革命的否定扩展到对布尔什维克党、它的领袖列宁和它的策略上。在这方面最为人所诟病的一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二是解散立宪会议。

前者说布尔什维克在它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多数后，才提出这个口号，足见它的阴险。这显然是对相关史料缺乏了解。在列宁回国前，斯大林、加米涅夫等布尔什维克领袖主张支持临时政府。在列宁回国并使党走上社会主义革

命的道路后，它就一直坚决反对联合政府，主张没有资产阶级代表的苏维埃掌权。当时在俄国已经形成了双重政权——一方面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与资产阶级组成的临时政府，另一方面是二月革命后组成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苏维埃。当时列宁的立场是通过民主斗争争取赢得苏维埃的多数，即进行苏维埃民主革命。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反对临时政府的斗争的口号。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这个口号可以追溯到5月初。托洛茨基早在5月7日（俄历）举行的统一社会民主党全市代表会议上，就提到了这个口号：“我们给自己提出了明确的任務，即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是今天的问题。我们知道，夺取政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取决于事件发展的速度。我们不说绕开苏维埃夺取政权，因为它是整个革命民主派政体的代表制的形式。我们只应该力求在苏维埃中形成自己的多数，用真正革命的内容去充实它，围绕着我们口号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说得十分清楚了。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托洛茨基刚刚回国不久，他还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甚至还没有与列宁商谈他领导的区联派组织与布尔什维克合并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口号在那时就是包括布尔什维克（以它为主）在内的苏维埃左翼的口号了。至少，在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工人游行队伍就打出了这个口号。而在当时，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占多数时，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意味着全部政权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对解散立宪会议的指责更为严厉，有学者撰写长文，说布尔什维克以允诺召开立宪会议夺取了政权，一朝政权在手，在立宪会议选举失败后，不是顺应民意交出政权，而是背信弃义地解散了立宪会议。还说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的书名名不副实，因为十月革命并没有发生什么像样的战斗（即不够暴力），只不过是当时频频更替的政府中的又一次而已（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苏汉诺夫在其《革命札记》中就是这么说的），而布尔什维克悍然解散立宪会议才是真正震撼世界的日子。这种说法只能表达作者对革命的蔑视和对立宪会议的尊崇，无论如何都不是当时亲历这两个事件的人民、各阶级、各政党和各个国家对它的感受的真实写照。

约翰·里德亲历了十月革命，他的感受是符合实际的。事实是，自从布尔什维克成为彼得格勒的多数，托洛茨基成为它的主席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资产阶级就一直惶惶不可终日，在他们千方百计地拖延的全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日益临近时，他们的焦虑达到了极点。这在当时的报刊上

都能反映出来。至于十月革命是否震撼，并不取决于夺取政权时是否进行了大规模的流血战斗，而取决于政权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及方针政策有无变化和变化的大小，更取决于它的后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无疑是十分震撼的。它将私人企业国有化，把土地分给农民，不仅退出帝国主义战争，而且还要公布各盟国与沙俄政府签订的秘密条约。当初颂扬它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元，并不夸张。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为穷人的利益剥夺富人的政权；它完全不遵守外交游戏规则，公布秘密条约，以揭露帝国主义战争是为了满足各国资产阶级的贪婪的胃口；它越过各交战国政府直接向它们的人民呼吁，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内战，以革命战争来消灭帝国主义战争。不仅是面临被剥夺的俄国资产阶级被这次“政变”所震撼，就是各交战国的政府在面对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在厌战的士兵中引起的反响时，能不胆战心惊吗？

笔者无意否认立宪会议即民主形式带来的好处，也不否认斯大林个人独裁与一党专政形成的局面有一定的联系。但如上面那位学者那样，说布尔什维克就是凭着许诺召开立宪会议才获得政权，而得到政权后就过河拆桥，解散了立宪会议，则是笔者不能苟同的，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全面的。

如上面所说，十月革命的成功，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主要靠的并不是许诺立即召开立宪会议，而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和平和土地的要求。和平和土地是人民的要求，是自发发动二月革命的人民的口号。立宪会议是政党的口号，它的提出要早得多，是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各政党提出的口号和目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早提出这个口号，是在1903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次年，社会革命党也提出了同样的口号。但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更为紧迫的是解决和平与土地的问题。在那时的俄国政党中，唯一一个要认真地解决和平和土地这两个问题的，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即使把立宪会议的口号看成与和平与土地一样重要的口号，它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和平和土地一样重要，那也不能据此指责布尔什维克背信弃义，因为它至少真正地落实了两个口号，即和平与土地。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在它们执政的八个月的过程中，没有为解决这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采取过一项严肃的措施。

而且在立宪会议的问题上，应该受到指责的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一个党。时任临时政府办公厅主任的纳博科夫说过，天真的人在理论上可以认为，政府召开立宪会议就是为了制定基本法，然后根据选举结果把政权交给选出的多数

党，然后就自动解散，实际绝非如此。一语泄露天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根本不想召开立宪会议。立宪会议在他们的手中，成了拒不解决和平与土地问题的挡箭牌。所有与群众利益相关的措施，他们都说自己无权决定，推给立宪会议，而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措施，则立即拍板，也用不着等立宪会议了。群众对他们的不满，部分就是由此而来的。

立宪会议的选举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民意，也是值得怀疑的。原因有二。一是社会革命党人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得到 2100 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 60%。但他们的票源主要是来自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在城市里，他们的得票不仅大大落后于布尔什维克，还少于立宪民主党。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表明，社会革命党作为执政党在 2—10 月间的表现，以及社会革命党人任总理的政府在后来几个月中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它声誉扫地。工人阶级和它的武装——赤卫队——对它深恶痛绝，军队的绝大多数也支持布尔什维克，在 10 月中旬，当布尔什维克成为全国各主要苏维埃的多数时，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已经退出苏维埃。一个仅靠农村人口庞大的基数而成为多数的党，甚至支持它的农民也主要来自边远地区，而在城市 and 军队中都得不到支持的党，在主要行政资源都来自城市的现代社会中，能组建一个什么政府呢？肯定不会是该党一直叫嚷要建立的强硬政府，而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政府。指望这个政府来解决和平和土地问题，肯定是不行的。一个执政几个月的政党，连它的基本纲领——把土地分给农民——都不能实施，甚至连为实施它的准备都不做，只是一味地把它推给立宪会议。这样的党即使让它再次组阁，它又能做什么呢？在它过去为苏维埃的多数派和执政党的六个月中已经给出了答案。这个事实不会因为在这个党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获得多数而改变，何况这个多数本身也是有疑问的。

十月革命前，社会革命党分裂为两派，一个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另一个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府官员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逮捕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实施社会革命党的基本纲领——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由于立宪会议各党派代表的名单还是在 7、8 月间定的，在 9、10 月间已经是水火不相容的左派、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交替出现在同一个党的名单中，而且其中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占全部社会革命党代表的 3/4，完全不能反映十月革命前后这两派在群众中的实际影响。因为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中，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获得 70 个席位，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只有 16 席，中派社会革命党人 36 席，少数民族社会革命党人 7 席。即使中派和少数民族社会革命党人都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致，他们所得的全部选票也要少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变化的原因可能在于下面的事实，即十月革命后，电报邮局系统对苏维埃政权的消极怠工，临时政府被推翻、社会革命党分裂的消息迟迟不能传到外省，更不用说是边远地区了。大多数农民本来是想把票投给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在土地委员会工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际上却把票投给了作为政府代表逮捕他们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

谁应该对一党专政负责

当然，有人会说，如果立宪会议得到尊重，肯定能避免由一党专政演变成的斯大林个人专制制度，以及由此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其实，解散立宪会议并不意味着民主制的终结。在公认的民主国家中，解散议会和重新选举之事也屡见不鲜。而当初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解散了立宪会议之后，再也没有召开，确实也有客观历史原因。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应对此负一定的责任。

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苏维埃的多数时，他们千方百计地不让一个布尔什维克进入主席团，当布尔什维克已占苏维埃的 1/3 席位时，也是如此。当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占了一半的席位后，在 9 月进行了主席团改选，结果是布尔什维克在主席团中成了多数，托洛茨基成为苏维埃主席。当布尔什维克党团建议按各党派在苏维埃的席位建立联合主席团时，遭到从苏维埃多数沦为少数的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断然拒绝。策列铁里说：“我们在六个月的的时间里领导彼得格勒苏维埃，使它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我们希望你们在你们现在准备占据的位置上哪怕只维持这个时间的一半。”对一个他们认为连三个月都维持不了的党派，他们当然不会认真对待，更不会以少数派的身份充当合作伙伴。实际上，在这种对对手的轻蔑和强硬的态度之后，隐藏着极度的失落和绝望。他们曾是苏维埃绝大多数，他们还掌握着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让“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在七月事件中已经被彻底消灭的布尔什维克打败，留在他们心中的绝不仅仅是苦涩。其实他们心里早就明白，他们在苏维埃中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们人为地拼凑一个“全俄民主会议”，筹备

“预备议会”，就是为了绕开苏维埃，这也表明他们实际上对靠民主斗争重新赢得多数没有任何信心。

在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曾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提出联合组建政府的建议，并与他们进行相关的谈判。在谈判中，被击败的少数却对胜利的多数提出了根本不能接受的条件：列宁和托洛茨基不能加入联合政府。这是连最温和的布尔什维克都不能接受的，最最温和的加米涅夫也说，没有列宁和托洛茨基，就是“砍了党的头”。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也允许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作为苏维埃的少数在苏维埃制度下有充分活动的自由。但由于曾经的多数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失败，不愿意承认政权的更迭是布尔什维克赢得苏维埃的多数的必然结果，更不愿意在苏维埃中履行自己少数派的职责，他们把十月革命斥责为阴谋政变，不予承认。也就是说，在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失去了在苏维埃中的多数和对主席团的控制后，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使得在苏维埃民主框架内的多党合作与斗争失去了前提。在十月革命后，他们更是与“阴谋政变”直接对抗，进入战争状态。虽然他们在作为执政党的六个月里，没有表现出任何魄力和果断，但在失去了执政党和多数的地位后，却一反常态，立即行动起来。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面临的怠工抵制，就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与资产阶级一起组织的。新生的工农政权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不仅各部职员、邮局、电报局和铁路工会不为新政权服务，政府部门连翻译和缮写员都找不到。后来他们参与和组织了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在内战中，他们和资产阶级一起组织白卫军，不少人加入了形形色色的反苏维埃政权。在战争形势下，禁止敌对政党的存在，查封它们的报纸，应属正常措施，并不能说明布尔什维克的暴虐。

在革命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并肩战斗，一起推翻了临时政府，后来又与布尔什维克一起组成联合政府。但在布尔什维克签署了他们认为是卖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后，他们又走上了恐怖主义的老路，为了挑起与德国的战争，他们刺杀了德国驻俄大使米尔巴赫伯爵，同时发起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联合的破裂和对它的镇压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就是这样历史地形成的，它并不完全是布尔什维克意志的产物。

* * *

对重大历史事件有不同看法，本是十分正常的，何况是十月革命这样一场

天翻地覆的革命。可现在看到的，无论是过去对它的顶礼膜拜，还是今天对它的否定，都缺乏史料支撑，情绪多于理性。《先知三部曲》的出版为重新研究、认识这场革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参照系，因为重新评价托洛茨基，绝不是简单地为一个冤假错案的牺牲者平反，而是事关对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再认识。托洛茨基在列宁因病退出政坛之后，直到他被斯大林派的杀手刺杀之前，对斯大林在理论、内政外交乃至社会生活领域推行的政策的批判中，提出了一条与斯大林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路线。在世界革命和反法西斯斗争的舞台上，他是当时唯一一个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洞悉纳粹本质和它将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的人，并提出一条能战胜纳粹，阻止它掌权的切实可行战略——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战胜自下而上的反革命。同时，他严厉地批判了斯大林推行的导致德国共产党不战而降的自杀性的“第三时期理论”和后来右倾投降的“人民阵线”政策。正如俄国历史学家瓦迪姆·罗高文在倾其最后 15 年精力完成的 7 卷本巨著——《是否有另一种选择》——中所说的那样，托洛茨基的理论、方针、路线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而且这一选择很可能是对人类社会进行符合人类发展进程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切实可行的道路。遗憾的是，《先知三部曲》于 1999 年出版后，在国内只引起了一股小小的托洛茨基热，但很快又复归平寂，远不如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布哈林热。直到 90 年代，国内仍有研究布哈林的文章和专著出版。然而，无论是在革命、内战还是后来的党内斗争中，布哈林所起的作用都不能与托洛茨基相比。对他来说，幸运的是，他的平反是在革命后期，而托洛茨基是在后革命时期才重归革命家行列的。《先知三部曲》引起的兴趣没有后续。笔者在近几年内翻译了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时期的文集 3 卷，流亡海外时期的文集 3 卷，至今没有联系到愿意出版这些文集的出版社。笔者还曾向多家出版社推荐托洛茨基的专题文集，如在 1905 年革命 100 周年时出版托洛茨基的文集《1905 年革命》，在反法西斯斗争胜利 60 周年时出版《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以及《托洛茨基论中国问题》、《托洛茨基论文化》、《托洛茨基论文学》等，均无结果。从 2008 年开始，托洛茨基的三本专题文集——《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

几十年的诬陷、禁锢，仅凭一套《先知三部曲》是无法打破和消除的。读者难以全面认识托洛茨基的另一个原因是此人著述甚丰，据西方学者统计，

托洛茨基的全集可达150卷之多，另一种说法是80多卷。译成中文的只有10多卷，其中包括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国托派翻译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和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后两个译本只能在图书馆找到，读者非常有限。1949年以后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都是内部读物，发行和读者面均很窄。1992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与革命》一书，大概是解放后国内第一部非内部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因而，国内至今对这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了解十分有限。虽然如此，对这个在联共（布）党史研究中绕不开的人物又好像谁都能说上几句，而且言之凿凿。过去，托洛茨基和托派是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的代名词，托洛茨基是列宁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如今则给他扣上“革命狂人”和“左”的帽子，不是革命时代“左”比右好的左，而是现在令国人深恶痛绝的极“左”。因而这个堪称革命经典的真正的思想宝库对中国读者来说，仍继续被尘封。

托洛茨基和列宁一样，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世界——的开拓者，是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领袖，十月革命和内战的胜利就是证明。列宁因病于1923年初就退出了政坛因而无缘领导或提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观点和防止执政的革命政党的官僚退化的斗争方法。托洛茨基在这场斗争中虽然失败，但他参与领导了这场斗争，其间写下了大量文章，不仅是对对手破坏民主的官僚退化的批判，还有对这个现象的历史理论思考。这是他留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一笔巨大的财富，可惜的是各国共产党把它视为异端邪说，完全忽略了它，致使斯大林体制的弊端几乎成了后来所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通病。

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深刻思想、远见卓识、辩证法的娴熟运用，俯拾皆是。在此只举几个例子。例如，他对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的党委制的批评，十分经典。众所周知，党委制起源于内战时期普遍推行的政委制。其原因是当时不得不起用旧军官。为了监督并不十分情愿为革命作战的旧军官，防止他们叛变倒戈，设立了政委制。后来，这一本是临时的措施被制度化，而且从军队推广到所有领域中。托洛茨基在其《斯大林评传》中说，政委制就像盖楼房时搭的脚手架，一旦楼房盖好后，就应该拆除它。

本书中提到的他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辩护，亲自给巴甫洛夫院士写信，调和心理分析与条件反射学说之间的对立，表明了对人类文化科学创造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态度：以博大开放胸怀对待人类文明。在此只想提一下，中国和苏

联都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对心理分析解禁的。再回想一下斯大林时代对摩尔根遗传学和基因说的态度，其印记在我国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出版的词典中还能看到。当时曾无限抬高米丘林，贬抑瓦维洛夫院士的遗传学研究，称后者为反动的摩尔根遗传学的徒子徒孙，直至将他迫害致死。二者对比，高下优劣自然分明。这说明对人类文明的狭隘的仇恨和批判，是官僚无知和宗派主义的产物，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当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最大的差异表现在国外阶级斗争和革命之中。斯大林的宫廷阴谋和背后搞小动作的伎俩，是不能保证在这些战场上赢得胜利的，实践证明，在这方面，斯大林的记录中是一连串的败绩：1923 年的德国革命、1926 年的英国总罢工、1927 年的中国革命，尤其是 30 年代的德国反纳粹斗争和欧洲的反法西斯斗争，都充分证明“英明伟大”、“永远正确”的斯大林根本没有能力在世界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舞台上、在自下而上的革命和自下而上的反革命（法西斯）之间的斗争中成为胜利的领袖。他所擅长的在特殊条件下的党内斗争中使他得到胜利的宫廷倾轧、幕后搞小动作的伎俩在这里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运用，结果只能是《苏德和平友好条约》及它的秘密协议。这虽然能使斯大林为所谓“赢得时间”和与德国一起瓜分波兰而得意一时，但在面临德方“背信弃义”地撕毁条约大举进攻苏联时，他竟“失踪”了好几天，才缓过神来。斯大林在 1943 年解散共产国际，主要原因大概就是他发现，对他来说，领导外国共产党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远不如在“一个国家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样得心应手。这里的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中，但在国外，他能够控制的只是共产党，他无力让他控制下的共产党领导各国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更不用说法西斯了。既然如此，不如把它解散，踏踏实实地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

威廉·夏伊勒在其《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有这样的话，当时各国政治家一直搞不清楚希特勒是不是疯子，在巨大的灾难降临之后才确认他是疯子，但为时已晚，几千万生灵已经涂炭。作者指的是希特勒上台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直到那时欧洲各国政治家仍未能清醒地意识到他是一个能给人类带来如此之大的灾难的疯子，各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想利用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想把祸水东引的《慕尼黑协定》和《苏德和平友好条约》以及其中的秘密协议了。而托洛茨基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洞穿了纳粹的本质和它将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两相比较，差距是何等之大啊。90

年代末，德国重新出版了托洛茨基当年反法西斯文章的文集——《纳粹肖像》。书中收入了托洛茨基于1930—1934年间写的十篇文章。编者前言写道：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纳粹上台是不可避免的，命里注定的。但托洛茨基的文章表明，如果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能够接受他对德国形势和法西斯的分析、判断，对它们在与纳粹斗争中错误理论和路线的批判，以及他提出的正确斗争方法，是完全有可能阻止纳粹上台的，而且他当时提出的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来对抗自下而上的反革命，确实是战胜纳粹的切实可行的战略。

托洛茨基对德国形势发展的准确判断和预见来自于他对纳粹党性质的科学认识和剖析，来自于他对德国主要政治力量对比的准确把握。“第三时期”理论把社会民主党定性为法西斯政党，而且认为德国共产党应该集中力量打击社会法西斯党，这样就把法西斯这个反革命阵营中的特殊的党与一般的资产阶级政党混为一谈。针对这点，托洛茨基对纳粹进行了科学定性。他把纳粹定性为代表小资产阶级绝望的党，纳粹运动与历史上一般都是自上而下的反革命运动不同，它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反革命运动。^① 俄国革命史和欧洲工人运动史证明，小资产阶级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角色。在政治斗争中，他们往往追随表现得更自信、更勇敢、更有能力与国家面临的困境作斗争的一方。俄国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在十月革命中获得胜利，就是因为追随它的除了工人阶级之外，还有大量动摇不定、分散孤立的城乡小资产阶级。因此，在德国当时极端严重的社会危机下，小资产阶级并不是注定要追随希特勒的，它也有转向革命的可能。但这要求德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站在时局的至高点上，表现出它的力量以及能够扭转乾坤，使整个民族走上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的能力。为此，它首先需要把工人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1929—1933年间，托洛茨基始终坚持德国局势的钥匙在德国共产党手中，依据的就是他对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历史、心理的准确把握。因此他相信，只要德国共产党能够制定并推行合理的政策，工人阶级表现出它的力量和必胜的信心，就可以把中产阶级下层中的大部分吸引到自己一边来，使来源于工人阶级软弱和小资产阶级过于膨胀的虚荣心的纳粹力量化为乌有。^② 至于希特勒是不是疯子，托洛茨基的观点显然要高明得多。他认为，德国的危机使小资产阶级夸大了它对阶级斗争的恐惧，产生了狂热的民族主义的自豪感，这是数百万沦为赤贫的小资产

①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 17 - 18, стр. 46.

② См.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 29 - 30, стр. 24, сентябрь 1932 г.

阶级患上的政治神经官能症，希特勒是身患这种病症的典型人物。

如今，由于极左滥用，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已经不以为然了。不过，看了托洛茨基对当年德国纳粹所作的阶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斗争策略，足以证明在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比所有其他方法更高明。

* * *

三部曲的意义和价值在第一版的《译者前言》中已经说过，这里不再赘述。在此只谈谈笔者对作者某些个别观点和说法的异议以及根据近来的研究和发现对他的叙述加以补充。

列宁抵达斯莫尔尼宫的时间

笔者管见所及，关于列宁于10月24日来到斯莫尔尼宫的时间以及他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有两种说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10月24日夜晚，列宁到了斯莫尔尼宫，直接领导起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在对列宁于10月24日夜晚致中央委员会要求立即举行起义的那封信的注中，说列宁写完这封信之后，就前往斯莫尔尼宫，于深夜抵达那里并领导了十月革命。伊萨克·多伊彻在其《武装的先知》一书中，也说列宁是10月24日夜晚（evening）乔装来到斯莫尔尼宫，但他补充了一句，“他从最近几天藏身的维堡区悄悄前往斯莫尔尼宫的路途中，他并不知道他经过的首都实际上已在他的党的手里了”。《教程》和《武装的先知》都说列宁是在10月24日夜晚来到斯莫尔尼宫的，但在对列宁与起义之间的关系各执一词。《教程》说列宁在抵达斯莫尔尼宫后亲自领导了起义。而伊萨克·多伊彻则说他抵达这里之前，起义已经开始，并控制了彼得格勒大部分地区。注释与斯大林的《教程》都说列宁在抵达斯莫尔尼宫后领导了十月革命，不同之处是注释说的是深夜，《教程》说的是夜晚。深夜只能是在12点之后，而8至12点以前都可以称为“夜晚”。

列宁的那封信证明他根本不可能于10月24日夜晚来到斯莫尔尼宫。当时正在躲避临时政府通缉的列宁根本就不知道中央委员会在10月24日上午作出